

遏制婚育率和生育率下滑需多策并举

——访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代表、荆州市婚姻家庭法学会会长李华成

本报记者 徐艳红



在课堂内外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婚育课程，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年轻大学生们在成人初始就尽快树立正确的婚育观。

优先为经济较困难的婚恋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打消适龄婚育人群“无法结”的尴尬

“住房是阻碍适龄人群不婚育或晚婚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年轻人主要集中在房价过高的中大城市，高昂房价让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年轻人会因无房而不能步入婚姻殿堂。李华成说起自己学生小余的情况。2016年，均来自农村的小余和小丁相识相恋，但二人因无法在工作的城市拥有一个“有独立卫浴”的居室，恋爱3年没有领结婚证。直到2020年7月，小余研究生毕业获得所在城市拎包入住人才公寓的申请资格，经过5个月的申请，2021年1月入住后，小余和小丁才领取了结婚证。

李华成说，韩国政府为激励婚育曾实施过“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如果各地能尽快修改公租房政策，将部分年轻人婚育房产纳入保障住房范畴并优先排序，相信越来越多的适龄婚育人群会有更强意愿尽早营造“温馨家庭”。当然，可能还需要在保障性住房的租金上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帮助适龄婚育夫妇能较长时间“住得起”。

效果实施，小商小贩及农贸市场情况怎样？

银川市兴庆区湖滨市场是以个体商家为主的农贸市场，商户们仍在使用免费不可降解塑料袋和打包盒餐具。

“我们店塑料袋是在网上买的，大概2至3元一斤，免费提供给顾客。”个体户陈先生说，因为是小本生意，塑料袋只能使用便宜的，对于颁发的“限塑令”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不太了解。

“我们塑料袋基本都是这种的，可降解材质的太贵，即便进货买的人也很少。”在银川市金凤区兴旺巷金凤综合批发市场，批发商拿出一沓薄塑料袋告诉记者。

“调研发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只注重末端治理，而忽略了全过程监管。”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建议，应严格界定特殊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范围，明确生产、销售和使用者法律责任，明确一次性塑料袋生产、经营、消费各环节监管部门的责任及对其失职的追责。让一次性塑料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者有法可依，有部门监管，失职有人追责，以遏制一次性塑料袋的无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

“小摊贩、小商铺是政府部门监管的‘盲区’，塑料袋都是免费提供，无法达到降低塑料袋使用的目的。”九三学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建议，加强源头治理和政策落实，联合相关部门对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使用严格把关，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严厉处罚，将“限塑令”纳入相关法律体系，逐步实现强制执行。

“还应该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落实好相关财税政策，加大可循环、可降解材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从而提升替代材料和产品性能。”自治区政协委员黄华说。

委员们希望，鼓励生产销售平价又便于携带的环保塑料制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对利用新材料技术企业的科技研发予以补贴，对生产和销售可降解材料减免税收，对生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行高额税收，从源头堵住“白色污染”，让公众用上更加方便环保的替代产品。同时，要规范塑料制品回收、处置等系统性措施，通过奖补方式，提高回收率，减少环境污染。

期待计划内生育全免费，打消适龄婚育人群“生不起”的顾虑

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并没有扭转我国人口生育持续下降的颓势，“生不起”成为部分适龄婚育人群的口头禅。生育保险制度虽然已经实施多年，但其覆盖面仍然有限，多数农村育龄妇女并没有参加生育保险，为此，她们必须自己承担高昂的生产费用。此外，李华成表示，即使能够享受生育保险的妇女，其生育保险也不可能覆盖从初次产检到最后生产过程的所有费用。“澳大利亚政府为鼓励生育，妇女生产住院期间，几乎不用花一分钱，每天除了有助产护士照顾，住院医生还会进行细致的例行检查，并配有专业的护工配送一日三餐。”李华成举例，“希望我国也尽快修改相关政策法规，让计划内生育全免费的时代尽早到来，打消适龄婚育人群“生不起”的顾虑。”

前文提到的小余夫妇人住公寓已一年，作为刚入职一年的年轻律师，小余收入尚不稳定，大专毕业的小丁是公司文员，薪水刚刚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因此，双方还没有考虑生育一事，均表示事业没有大起色、没有足够积蓄，生孩子计划只能适当推后。

二孩、三孩适当补贴政策尽快到来，打消愿意生育人群“养不起”的顾虑

孩子不仅是父母的孩子，父母要

承担负责，他们也是社会公民，成年后要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和重担，国家和全社会也应当对养育孩子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李华成以法国为例，称法国在二战后就出台了“生育第三个孩子每月可获一定津贴直到18岁”的政策，我国也可以结合财政状况和地区差异，制定对二孩、三孩生育家庭予以适当津贴补助的政策，帮助适龄婚育夫妇“养得起”更多的孩子。他仍以小余夫妻二人为例，小两口年龄分别为28岁和26岁，俩人所在公寓有相当一部分与他们一样刚结婚或是“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大多都没有生育。小余告诉李教授，他们周围这群年轻人基本都来自外地，计划在35岁前完成生育，考虑到托育照顾费用问题，都没有想过生育二孩，更不提三孩，目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过自己目前这样的生活。

严惩不利婚育生育的违法行为，清理不利婚育生育的不当政策

为营造良好婚育文化氛围，我们还需要严惩相关违法行为。李华成说，“比如，可以赋予社区或单位及相关部门一定职责，使其对父母阻挠子女结婚的行为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要严格落实堕胎的条件程序，尽可能保护育龄妇女的身体健康和正在正常发育的胎儿生命，对不符合流产情形的堕胎行为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罚。”此外，相当多的企业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禁止女员工“未经单位同意私自”生育，并不时发生企业愿意承担违法代价也要辞退怀孕女员工等情况。实践中，还有部分高校对在校大学生的婚育持“反对”态度，主要体现在在政策上，不为大学生婚育提供必要便利，如不允许课程缓考和休学，以及设置复学障碍等。

婚育生育不仅仅是公民的私事，更是事关社会稳定发展和人类自身存续的大事，国家和全社会应当高度重视婚育持续负增长现象。“在一个有着浓厚婚育文化的社会，我们要找准适龄人群不婚不育的症因，针对性地制定体系化的政策法规，并逐一加以破解，如此，我们的婚育率必然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李华成最后说。

建言

JIANYAN JISHU

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苏光华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主体意识不强不想为。不少农民群众认为乡村振兴只是党委政府的事，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靠着墙晒太阳，等着政府送振兴”“政府拼命干，农民一边看”现象普遍存在。一部分干部与农民沟通不够，忽视农民群众意见，代农民做主、代包代办。出现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农民与新型经营主体股份合作较少，受益效果不明显。

能力水平不高不会为。一方面，参与乡村振兴农民队伍结构不合理，结构不优、力量不强、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农民振兴乡村能力不足，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当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有13%。

体制机制不畅不能为。农民群众反映上级部署的任务多、要求高、检查督促多，但指令多指导少。保障农民全程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尚未建立。存在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全面保障的现象。

为此，笔者建议：
一、激活主体。巧用农民喜闻乐见的院坝会、农村大喇叭等宣传方式，全方位宣传乡村振兴有关政策，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倡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在实处走在前列。大力宣传各类先进典型，制定奖励先进典型办法，在产业项目、技能培训、资金信贷方面给予适当倾斜。积极推广各种

提高志愿者服务热情 应完善激励褒奖制度

本报记者 照宁 通讯员 邓楠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尤其是疫情防控工作中，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冲锋在前的战士，志愿者就是用脚步织密分区疫情的防控网，为人民群众筑起的一道坚实而有力的“安全防线”。但是，目前志愿服务存在持续性不强、对志愿者的激励褒奖政策有效性不足等诸多问题，这引起了农工党厦门市委的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市现共有86万多名志愿者、6000多个志愿服务团、56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117个公共场所志愿服务驿站，已形成较为系统、规范的志愿者管理服务体系。

农工党厦门市委在调研中发现，厦门志愿者服务存在评定标准不够细致、科学等问题。星级志愿者评定分为一至五星级共五个级别，申报各星级的条件基本只限于志愿服务的时长，未对志愿者参与服务的性质、强度和强度进行细化量化。三星、四星、五星的评选要求偏高、评选链条过长、评选人数偏少。星级评定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筛选推荐，主观色彩较浓，缺少社会化参与，透明度和群众认可度不够，同时也存在志愿者享有的福利保障不均等情况。

为此，农工党厦门市委建议建立完善积分和星级管理制度。从普通志愿者和卓越志愿者两个层次来建立和完善志愿者积分和星级管理制度。对普通志愿者采用积分管理办法，明确积分累计标准、积分

民生微实事

MINSHENG WEISHISHI

遵义汇川高桥街道：“贵人服务”有温度

近日，笔者走进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桥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只见服务窗口前，工作人员正耐心地为群众提供各项办事服务。近年来，高桥街道依托政务服务大厅阵地优势，推进“窗口前移”“服务前移”，着力打造“贵人服务”品牌。采取“2+2+2+2”模式，设置2个独立业务窗口（城乡医保、养老保险）、2个综合业务窗口、2个公安综合窗口、2个潮汐窗口，配套增设法律援助咨询室1

个、母婴室1间及多间综合办公室，以服务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同时，全面理清服务清单，规范明确办理材料和办理时间等要素，并以多种方式对外公布，推动85项服务事项全覆盖进驻政务服务大厅，避免群众办事“多头跑”。对不需要本人出面办理的事项，大厅工作人员根据群众委托，直接提供“全程代办服务”，以暖心服务为企业和群众打开方便之门。

（邓杰 夏雯珊）

调研一线

DIANYAN YIXIAN

莫让『限塑令』成『助塑令』！

马军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规定的出台，有效遏制了‘白色污染’，但也给了商家合法赚钱、大量售卖的依据，无形中推动了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限塑令’成了‘助塑令’。”近日，宁夏有关单位及政协委员提交社情民意，呼吁相关部门加强对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塑料购物袋是日常生活中的易耗品，我国每年要消耗大量的塑料购物袋。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过量使用和回收处理不到位等原因，也造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特别是超薄塑料购物袋容易破损，大多被随意丢弃，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自2008年“限塑令”实施后，塑料制品使用量虽得到一定控制，但电商、外卖等新业态产业又成了“限塑令”的监管盲点，塑料制品使用量不降反升。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走访了银川市部分大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地了解“限塑令”执行情况。

“我们主要购进无纺布袋子、PLA材质的可降解塑料袋，需要消费者购买。”银川市兴庆区新百生活超市负责人李海波介绍，从2020年12月宁夏“限塑令”发布以来，超市严格执行方案内容，所有塑料购物袋都换成可降解袋，目前每天约销售2000只至3000只。

记者又走访了银川市北京华联、华润万家、小任果业等地，均换成无纺布袋子和可降解塑料袋。

“限塑令”在大商场、超市得到有